

海神不是那些被统治者屡次封诰的大神，而是众多声名局限于部分地区的神祇 庇佑江南的海神，从不只有龙王



滕新贤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
滕新贤

早在上古时期，我国先民就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产生了对于海洋的幻想和崇拜，并由此创造出了庞大的海洋神系。在中国历史上，以海神身份出现过的神祇多达数百位。其中地位最正统的海神，莫过于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得到历代官方祭祀和封诰的四大海神，即南海之神祝融、东海之神句芒、北海之神玄冥、西海之神蓐收。而说到封诰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海神，则当数宋代时出现的女性海神妈祖。然而在江南沿海地区，人民尊崇的海神不是那些被统治者屡次封诰的海洋大神，而是众多声名局限于部分地区的地方性海洋神祇，以及佛教、道教，甚至天主教中的某些宗教神祇。

江南海洋神系国内最复杂

就地区性海洋神系的复杂程度来说，国内几乎没有哪个区域能够与江南地区相比。据笔者对常熟、上海、杭州、宁波等15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仅唐宋以来的海神就有60多位。海神数量如此之多，一方面与江南地区的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受吴越巫风文化的影响。东临大海的地理环境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鱼盐之利和航海贸易在为江南地区带来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得这里的渔民和商人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在科技尚不十分发达的古代，面对各种频发的海洋灾难，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神灵护佑，由此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海神信仰。此外，江南地多水泽，蛇虫滋生，河湖动辄泛滥，海潮屡灾侵袭。在这些自然灾难面前，人们深感祸福无常，祭祀鬼神的活动繁多。受此影响，海神的数量也比其他地区多了很多。

江南一带的海神类型多样，不仅有海洋水体神，更有航海保护神、海洋漕运神（元代的漕运为海运）、潮神、渔业神、盐业神等。这些海洋神祇大致上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官方认定的东海主神，如东海之神、东海龙王（清雍正二年以后）等。这类海神的地位非常尊贵。如东海之神，早在唐天宝十年就被唐玄宗封为“广德王”。宋代时，仁宗又将其封为“渊圣广德王”。到了元代，东海之神的封号从“广德灵会王”直升至“东海助顺圣德威济王”，封号多达10个字，足见其地位之高。二是人鬼海神，所谓人鬼神，即一些深受百姓喜爱的人物在去世后被人们尊为神灵。在江南地区的海洋神系中，这一类海神的数量最多。如，广为人知的潮神伍子胥本为春秋时期吴国大夫，后被国君夫差逼令自杀并被抛尸江上。百姓怜之，尊其为神。又如温州永嘉的航海保护神太尉尉侯，相传是南宋时滨海而居的人，经常借假寐之际拯救倾覆的船只，后因保护商船免受海盗袭击而死。乡人感其恩德，奉其为神。还有在历史上声名不佳，但开凿大运河造福江南的隋炀帝，其灵魂也被舟山人民尊为航海保护神。三是本地化的外来海神。这类海神来自福建的地方



赵旭腾

天一阁博物馆馆员
赵旭腾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剧中的龙族三太子敖丙也摆脱了以往的反派形象，成为观众讨论的热点。那么，在东海之滨的浙江，龙王到底是怎样的形象呢？

实际上，龙王与哪吒同出一源，最早都来自佛教。早在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竺法护于译出的四卷《海龙王经》中就有龙王形象，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中的龙王形象逐渐普及。同时，道教也试图将龙王化进道教神仙体系中，《太上洞渊请雨龙王经》中就出现了众多降雨龙王。在唐五代杜光庭所著记载道教科仪的《太上黄篆斋仪》中记载了召唤南方水帝龙王。而唐代的一些笔记小说则将龙王形象进一步人格化了，如唐代传奇《柳毅传》中出现了诸如“洞庭龙君”“钱塘龙君”“泾川龙君”这样人格化的龙神。其中的“钱塘龙君”并不是钱塘江的龙神，而是钱塘湖，也就是西湖的龙神。

与今天的影视作品动辄就是“四海龙王”不同，自宋代以来，用于祈雨的龙王庙，祭祀对象往往是江、湖、潭中的龙王，其形象更类似于《西游记》中乌鸡国故事中的“井龙王”。浙江最早的龙王庙就是从钱塘湖龙王，绝大多数的龙王庙则是从龙潭演化而来的。这是因为龙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降



2月19日，南京幕府山庄社区，一所学校的小学生舞龙队在参加元宵节社区文化演出。

视觉中国供图

性海神居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女性海神妈祖。妈祖本是福建莆田一带的地方性海神。北宋时期，闽籍游宦和海商们将妈祖信仰传入了浙江嘉兴、宁波等地。其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妈祖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信众范围扩大至今上海、苏州等地，成为江南部分地区较有影响的海神。四是全能型宗教神祇。如佛教的观音菩萨、道教的冲应真人、天主教的天主等。从宗教角度来说，他们并不是海神。但由于宗教的传播以及信众的虔诚，他们实际上是被渔民和海商们当作海神来祭拜的，因而可以算作“准海神”。

官方的东海神存在感偏低

从江南地区海神信仰的实际情况来看，那些被官方认定的海洋大神存在感明显偏低。如作为四大海神之一的东海之神，尽管早就得到官方的高度认可，且北宋以来官方供奉的东海神庙就位于宁波镇海，然而其影响力却很小。仅在镇海本地，就有龙王信仰的影响力可与之抗衡。在笔者所调研的15个江南沿海市县中，几乎没有关于东海之神显灵的传说，而有关显灵侯、隋炀帝、褒应王等海神显灵的传说则为数不少。可见，对于江南一带沿海地区的渔民、海商们来说，只有经常显灵相助的海神，才是他们认可的。这一现象充分体现出江南地区务实的文化特征。也正因此，江南，尤其是吴越地区的海神数量极多，通常一个地区内会同时供奉几位神职相同的海神。以潮神为例，吴越地区的潮神既有大名鼎鼎的伍子胥，也有以孝道闻名的曹娥，而在地方祀典中，以及

民间神祇更具教化功能

江南地区素来注重教化。这一点在海神信仰方面也有明显体现。纵观江南一带的人鬼型海神，几乎全部是那些忠孝节义、勤政

在浙江，龙王是种什么样的存在

雨，而早在龙王信仰盛行之前，浙江民众就有向潭水祈雨，然后取潭水里的生物而归的祈雨方式。之所以选择潭水祭祀，是因为这些深山中的水潭往往四时不竭，尤其是夏季干旱时，仍能保持潭水清澈，深不见底，且附近景色绝美，潭前飞瀑如练，山间云雾缭绕，使得乡民认为潭水中有神灵庇佑。在这些潭水受龙王传说与祭祀的影响变为龙潭、龙王庙后，官方的祈雨方式也继承自潭水祈雨：官员或者乡贤先在龙潭庙祈祷，再向龙潭中投入祭文，这些祭文有些写在铁筒上，有些写在丝帛上再放入瓶中，投入祭文后，官员和乡贤将潭中或潭边出现的蛇、鳝、金线蛭视为龙王的信物，把它们带回寺庙供奉以祈求龙王赐雨。在杭州和绍兴等地都发现了这些祭祀龙王使用的金龙、银筒等文物。

广为人知的东海龙王，则主要分布在沿海的宁波与台州，以鄞县洪圣庙和镇海南熏门外龙王宫为代表。其余各府，除了雍正五年朝廷遣官斋送至杭州瑞石山，由李卫建庙祭祀的“福越滋农龙王”外，基本都是本土龙神，包括东海龙王在内的四海龙王以及五方龙神，虽然因为出现在《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中，在民间传播很广，在皇家祀典中也有一席之地，如雍正二年就曾“加封四海龙神，东海曰显仁，南海曰昭明，西海曰正恒，北海曰崇礼”，但在地方祀典中，接受度并不如本地龙王。

这是因为在时人心中，正如地方官主政

一方，本地的龙神更能庇佑一方水土。同时，祭祀本地龙神也是府县行政的需求。根据方志记载，如府县久旱无雨时，地方官员往往要亲赴龙王庙祭祀祈雨，这些龙王庙都在府县境内。崇祯五年，鄞县大旱，知县王章前往鄞县青山三圣井龙潭祈雨；康熙三十五年，金华大旱，知县赵泰姓前往金华三断潭龙潭祈雨；康熙三十六年，衢州府大旱，守道董昭祚、知府张琳、西安知县陈鹏年，一同前往距府治南五里的乌龙殿祈雨；乾隆二十七年，浦江大旱，县令何子祥前往浦江灵济庙祈雨；同治十年，处州府大旱，知府潘绍治前往县西丽阳祠后的龙神祠祈雨。可以看出，府县官员更愿意向本地的龙神祭祀祈雨，而不是东海龙王。

同时，国家祭祀政策也利于本地龙神的发展，洪武三年，朱元璋颁诏矫正神号：“诏定镇海渚诸神，前代加以封号非宜，今并改正。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止称某府某县城隍之神。”这一政策让多数龙王的称号都加上了本地的山水名，这使得本地龙神庇佑本土乡本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因此明代方志中龙王庙的数量迅速增长，如部分天台的百丈潭、急泽潭、黄坛潭等潭水，在宋代方志中仅作为普通潭水记载，但在明代则已经升为龙潭，并且创建龙王庙专祀潭水。

值得一提的是，龙王并非最早的“四海之神”，也不是唯一的降雨之神。如唐代，朝廷祭祀的“四海之神”是“东海广德王，南海

爱民的历史人物。如常熟海神李王，相传是宋徽宗时宰相李邦彦的养子。他治水缉盗，造福百姓。其后因故以死报养父的养育之恩。在这一人物身上，集结了多种为百姓所敬重的品格。另如潮神伍子胥。东汉《论衡》中载其成为潮神的原因是“子胥患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而在将其奉为潮神的江南沿海地区，人们则传说伍子胥屡次以神力遏止海潮人侵，保护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于己有功才成为潮神。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民间的说法更具教化功能。

从江南地区海神的“籍贯”上看，大多数人鬼型海神生前属于江南人士，如平水王周凯、李王、张老相公等，但其中也有相当多的“外地人”，如宁波地区的航海保护神之一李显忠是陕西清渭人，而在清康熙年间由天妃晋升至天后的妈祖则是福建莆田人。他们虽非江南人士，但由于生前分别有抵御侵略、开凿运河、护佑航海人的功绩，江南人还是把他们列入了自己的神系，对其进行祭祀。江南文化中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特点在海神信仰中可谓体现得相当明显。

江南一带的海洋神祇虽然数量众多，看似杂乱，实际上却体现了江南地区特有的文化风貌。正是这些大多已不为今人所熟悉的地方性海神，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给予了那些漂泊于烟波浪里的人们无限慰藉。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有发达的航海技术和威武的海军保护，江南地区大多数海神的身影也逐渐隐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与我们渐行渐远了。

广利王，西海广润王，北海广泽王”（《唐会要》《大唐郊祀录》），四海之神虽有神名和封爵，却不是龙王。而后来民间的四海龙王中，“敖广”和“敖润”的名字或许就是来自于“东海广德王”与“西海广润王”。在龙王信仰盛行的同时，浙江的徐偃王庙和大禹庙等多种庙宇都有祈雨的功能。

为什么龙神信仰在宋代以后迅速被纳入祠祀系统，并成为主要的祈雨之神呢？除了上文提及的浙江本身就存在对深潭的自然崇拜这一因素外，从方志中记载的祈雨记录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龙的特性。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具有“兴云致雨”的能力。向龙王祈求布云降雨和收云止雨，符合当时民众的认知。更重要的是，龙的行踪飘忽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也解释了为何祈雨不应。明代宁波有一年五月、七月两次大旱，知府遍访鄞县各处龙潭，天均不雨，甚至前往慈溪龙王庙处祈雨，之后前往天井山祈雨得应的故事。之所以最后选择天井山，是因为天井山，即今天宁波海曙区五龙潭景区，距离府治过于遥远，即使以今天的公路前往，也有近90里的行程。因此，宁波知府在最后才选择了天井山龙神祭祀。幸运的是，在天井山龙潭祈雨后老天终于降雨，缓解了旱情。天井山龙王是幸运的，但是浙江其他府县的龙王往往没有这样的好运，使得其往往“久废圯圯”，直到下次祈雨诸庙不应后，地方官才会前往这些旧庙祈雨，若恰好此时雨云降临，则旧庙得以重修。

早在屈原投江千余年前 吴越已是“棹影飞万剑” 龙舟竞渡考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滕新贤 曹原

说起龙舟，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将它与端午节、屈原等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龙舟竞渡活动的出现时间要远远早于屈原所生活的时代，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与端午节发生联系。龙舟竞渡源于先秦时期吴、越、楚等江南地区的独木舟竞渡。早在7000多年前，河姆渡先民们就已经能够造出较为先进的独木舟。《越绝书》称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淮南子·齐俗训》中也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因而，竞渡活动也自然很早就出现于越地。1976年，浙江宁波鄞县云龙镇出土了一件羽人竞渡纹铜镜。该镜的一面铸有边框，框内上部为昂首相向的龙纹，下部以弧形边框为舟，舟上四个头戴羽毛冠的人坐成一排，双手持桨作奋力划船状，生动地展示了战国时期越人竞渡的场面。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竞渡活动采用龙舟，则已不可考。就现存资料来看，“龙舟”一词最早出现于典籍《穆天子传》，其中记载了周天子乘坐舟舟、龙舟游于大池的事迹。《说苑·奉使》载，越人“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可见，早期的龙舟竞渡具有明显的原始宗教意味。它既是一种竞技活动，也是一种娱神祈福活动。据闻一多先生考证，早在屈原投江的千余年前，吴越水乡就已经普遍存在划龙舟的习俗了。

尽管龙舟活动出现的时间很早，且几千年来在形式上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其文化内涵却经历了一番质的变革。据史料记载，西周以前的龙舟竞渡活动多在三月三、夏至等时间进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谷雨、夏至等节日逐渐合流演变为端午节，龙舟竞渡、吃粽子等习俗也随之变成了端午习俗。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们对于图腾龙的敬畏之心开始减弱，龙舟竞渡的文化内涵逐渐由以敬神祈福为主转为了以纪念人们心目中的先圣先贤为主。汉代赵晔的《吴越春秋》认为，龙舟“起于勾践，盖悯子胥之忠作”。

龙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与纪念屈原之间产生联系的时间相对较晚。真正使龙舟竞渡作为纪念屈原的活动项目而存在，并使之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唐代名相魏徵。由他主持编写的《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凭借着魏徵千古名相的声望以及《隋书》作为正史官书的权威性，此书对唐及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自此，绝大多数地区竞渡活动的文化内涵被统一在了“纪念屈原”这样一个富有爱国色彩且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主题之中，从而使得龙舟竞渡这一原本具有浓厚敬神祈福色彩的活动自此有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意味。屈原的爱国精神也自此随着龙舟竞渡活动的传播而对整个社会意识发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龙舟文化的精华部分。

隋唐时期，端午节已是全民性的民族节日，龙舟竞渡亦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广受欢迎的节日活动。唐代诗人张建封的《竞渡歌》就较全面地描绘了当时龙舟竞渡的盛况：“两岸罗衣掩翠羞，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拨划白首争不输，两岸一拥似战鼓。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岸上观者如云，呼声雷动，河上竞渡双方全力拼搏，誓不服输。龙舟赛事之盛，可谓历历在目。

隋唐以降，龙舟竞渡活动虽因舟楫倾覆以及竞渡者坠等原因而在部分地区遭到禁止，但始终是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喜爱的一种娱乐形式。宋人楼钥的“锦标赢得千人笑，画鼓敲残一半春。薄暮游船分散去，尚余箫鼓绕湖滨”，明人冯梦龙的“十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不重回。”等诗句都对当时的龙舟竞渡活动进行了生动描述。除诗文之外，历代画家们也用他们的画笔直接描摹了龙舟竞渡时欢快热闹的场景。如唐代李昭道的《龙舟竞渡图》，北宋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元代郑重的《龙舟竞渡图》，清代郎世宁的《雍正十二月行乐图》等画作分别为后人展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龙舟活动场景。从这些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至皇帝嫔妃，下至普通百姓，对龙舟竞渡活动无不兴趣盎然。

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国内战乱不息，百业凋敝，许多地方的龙舟活动被迫停办，龙舟活动跌入低谷。改革开放后，传统的龙舟活动重新焕发了生机。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龙舟运动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目前，上海“苏州河国际龙舟邀请赛”、宁波“东钱湖国际龙舟邀请赛”等赛事每年吸引着众多国外队伍参赛。

今年，首届“龙舟世界杯”已正式落户浙江宁波。明年，龙舟运动将作为东京奥运会的正式表演节目登上奥运舞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项源于江南水乡民俗赛事的运动，将以其强大的文化基因和独特魅力，迈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行列。

2017年重阳佳节，“斐讯杯”第七届上海市民龙舟大赛在青浦区夏阳湖举办。 本报资料照片